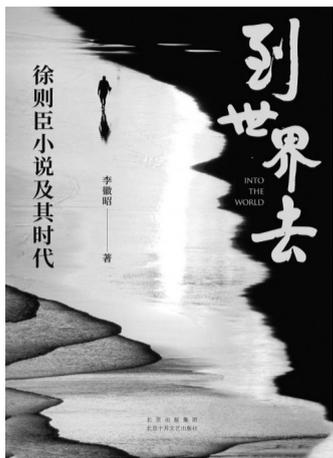


在故乡寻求世界的倒影

□金自强



《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
李微昭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年8月

李微昭的批评著作《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以下简称《到世界去》),像一条蜿蜒的运河,将徐则臣的文学世界与时代精神串联起来。李微昭以学者的敏锐与作家的共情,在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批评方法,揭示了徐则臣作品中个体与时代的复杂纠葛,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如何以本土经验回应世界性命题。

在徐则臣的文学版图中,“故乡”从未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苏北小镇。李微昭指出,徐则臣笔下的“花街”“石码头”“运河”等意象,实则是“流动的故乡”——它们既是记忆的容器,也是精神的起点。《北上》中的京杭大运河,既承载着百年家族秘史,也隐喻着个体对归属感的永恒追寻。李微昭将这种创作特质概括为“文学原乡的流动性”,认为徐则臣的故乡书写“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胎记”。

这种流动性的根源,或许与徐则臣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他生长于江苏石安运河边,后在淮安运河边求学工作,进而漂泊并定居北京。这种从苏北到“帝都”的轨迹,映射了改革开放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故乡需要被重新发现,它并非一成不变的起点,而是与世界不断对话的参照系”,正如《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阳,在卖掉祖宅、远赴异国的过程中,反而触摸到故乡更深层

的意义——它不再是困守的牢笼,而是理解世界的棱镜,从中可以窥测20世纪中国变革与精神生活新动向。

徐则臣的“到世界去”,绝非简单的空间位移。李微昭将其解构为三重维度:地理上的北上、文化上的突围,以及精神上的自我重构。这种多维度的“世界性”,使得徐则臣的小说既区别于传统乡土文学的封闭性,又避免了全球化叙事的浮泛感。李微昭尤其重视“人”在时代历史进程中的感触,“人”是涵盖多重身份与多维特征的,在急剧变革的风化浪潮中,以往的历史痕迹,即当代传统——恰似黑板报被人为性地逐渐抹去,属于“人”的自我意义在解构与重构中被人规定,李微昭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观念性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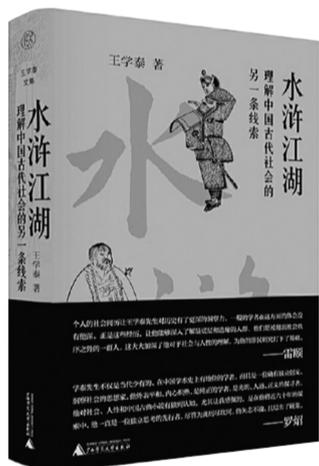
《到世界去》中,李微昭对徐则臣笔下人物的分析,突破了典型人物范式,转而关注边缘群体的精神症候。李微昭以“迷途女性”与“漂泊知识分子”为切口,剖析了徐则臣笔下人物的精神图谱,高棉、西夏、秦来等女性“她自己”的现代代表,《夜火车》中陈水年的出走悲歌与知识分子理想的挣脱。李微昭认为,这些人物身上“既有个体命运的挣扎,也有集体记忆的烙印”,他们的选择与困惑,恰是“70后”一代在时代巨变中精神漂泊的写照。这些人物被置于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成为时代剧变的“病理切片”。事

实上,对知识分子的刻画,李微昭揭示了其中更深层的悖论:他们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的对象。以《北上》中的谢平遥为例,他既试图通过西方视角发现运河的文化价值,又在历史洪流中陷入失语的困境。“这些世界性空间与人物行动、故事情节内外呼应,既是对本土空间与生活的反思,也借此与世界进行不同对话,文本由此超越了纯本土叙事,有着超越国族边界的世界文学意涵。”李微昭进一步指出,徐则臣通过此类人物的命运,质疑了单向度的“现代性”叙事,暗示真正的文化自觉需建立在对本土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之上。

作为一部批评著作,《到世界去》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对话性”。李微昭并未将徐则臣的作品视为封闭的文本,而是将其置于代际转换、文化碰撞、城乡变迁、世界互动等多重语境中——运河、饮食、交通、黄台村、工业区、出国访学,都构成了李微昭批评逻辑中的一环,书中还穿插了大量徐则臣的电邮、对话感言甚至硕士论文片段,构建起“作家—批评家—时代”的三维对话场域。《到世界去》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碰撞的今天,文学如何为漂泊的现代人提供精神栖居?或许,故乡不必固守,世界不必远求!当我们谈论“世界”时,脚下正踩着故乡的泥土;当我们回望“故乡”时,眼中已映出世界的倒影。

“水浒”背后的宋元游民社会

□赵昱华



《水浒江湖》
王学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2月

当我们提起水浒,你会想到什么?想必是经典名著《水浒传》,是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是江湖之大,是人心聚离。

这样的水浒,是人们对于“水泊梁山”所蕴含的“江湖”意味的提取与想象。而真正的“江湖”是个什么样子?它又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王学泰所著的这本《水浒江湖》带来的思考,探寻《水浒传》背后的历史逻辑。

王学泰指出,在《水浒传》面世之前,民间就已经流传着很多“水浒”故事。《水浒江湖》对于“游民江湖”这一隐性社会的存在、运作、特征、规范,做了深入的描写。在王学泰的定义里,“游民江湖”是一个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有其自然逻辑、能被人所感知,但却难以也不愿意对其进行深入挖掘的社会存在。

历史上,宋江确有其人,却并非《水浒传》中描写的那样,是“替天行道”之辈,宋江只是一个地方抢劫团伙的首领,率三十六人的骨干团队在梁山周边劫掠,后被朝廷招安。而水浒故事的形成,则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世人们将抗金义军的事迹、民间说书等内容扩充入内,逐渐将宋江这三十六人的团队定为了三十六天罡,进而

扩大成了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群像。

在以宋江为原型的叙事里,王学泰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招安,这是宋朝对于宋江团体这类游民武装的惯用伎俩。宋代以前,对于游民盗匪的大规模招安十分罕见,这类游民群体一经形成,往往成为声势浩大的起义军,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然而在宋朝,却形成了“有叛民而无叛军”的现象,个中缘由,就在于宋朝习惯性地无赖游民吸纳入军队之中,这一政策最终引向了宋朝军队战斗力下降与军事支出的显著增加,却也实实在在地遏制了底层社会的武装起义。

王学泰进而考察了这些反叛者的话语体系。例如,“替天行道”这一口号的诞生与应用。具体的出现时间已不可考证,有文献可考的出处,是元杂剧作者高文秀的剧本之中,自此不胫而走。王学泰认为,这一口号的出现,标志着“水浒”故事从强调“忠义”,转向了证明游民群体武装反抗的合理性,这是文士阶层在元初特定政治背景之下,意识形态转向“游民化”的表现。

正如王学泰所言,“水浒江湖”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游民社会”是游离于主流表层社会之外的隐性社会,自然而然与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并不相符,却也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犯罪集团的“恶德”。游民社会中的江湖人士所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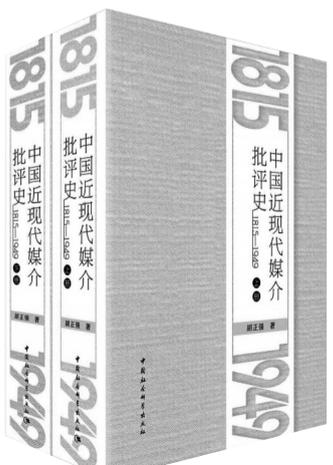
循的,乃是“生存”的逻辑,饥要食,寒要衣,江湖人士不仅要追求这种实际的需求,也恐惧自己因同样的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去。长久的压抑之下,便形成了如《水浒传》中所描述的好汉们的“快活观”——纵然短暂而非理性,也要追寻那短瞬间在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随心所欲。

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回归于现实,则表现为“江湖道义”的隐性规则,这一隐性规则经由《水浒传》的传播,交织成为了与主流社会相抗争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不仅仅是为反叛这一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客观成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与技巧;既是心理上的支撑,也是实践上的手段。作者据此认为,《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正是这种以反叛的形式争取自身利益的游民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对《水浒传》所展现出的“江湖”意象进行整理与剖析,《水浒传》所描写的,是江湖人的生活与抗争,是隐性社会之下的理想与道德,是江湖生活的规矩与方式。施耐庵用其笔触,描绘了一批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所不屑的“不逞之徒”,借由文学的笔法,将江湖及其所附带的“游民思想”普及到了社会之中。由此看来,《水浒传》在文学作品以外,同样是一部思想之作。

近现代媒介批评的中国脉络

□陈锐



《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
胡正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年5月

20世纪60年代,媒介批评学在西方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一门学科。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学引入我国后,学者们开始了正式、系统的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尤其在媒介批评理论、实践方面著述颇丰。但由于媒介批评史研究的滞后,影响了学科发展应有的均衡性,而且无形中限制了媒介批评学整体学科水平所应达到的高度。南京师范大学胡正强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将研究视野聚焦于媒介批评史的学者,《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是其20多年来不断开垦、默默耕耘这块知识园地的又一硕果。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和起点,“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也“则无复史之可言”。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文献散布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报刊、书籍、档案、书信等之中,且留存文本质量良莠不齐,由于史料匮乏,这一学术领域鲜有人问津。胡正强教授这部著作的出版,有效弥补了学界媒介批评史领域的研究缺憾。作者力求详尽而全面地发掘、整理第一手资料,形成该书的一大突出特点,即历时跨度之长、史料搜集之实、研究个案之多、内容涵盖之广,囊括以往研究成果并拓展益多,成为学人了解或研究近现代媒介批评的史学宝库。一方面,该书以历史人物为主

线,全面考察批评家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所列举并专门论述的媒介批评人物达100多人,新人物、新史料、新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该书重视对史料的整理、校勘、辨伪、辑佚,从过往媒介批评报章典籍中一篇篇地“打捞”出来与读者见面,内容几乎涵盖了我国历代媒介批评的所有类型,诸如书刊编辑方针、媒体间论战、官方媒介批评,以及媒体人、读者和社会活动家媒介批评等。特别是书中考证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是中国近代第一篇具有一定媒介批评意义的文本”,“《新闻纸略论》是中文报刊上第一篇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文字”等众多此前模糊不清的说法,正本清源,嘉惠学林匪浅。从这一角度而言,该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为深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提供了参考范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媒介批评活动的国家之一,如果上溯到西周时期“烽拆是警,实扰移关之民”的烽火传播说则更是源远流长,对如此漫长的媒介批评史作出系统梳理和探究实属不易,不但要描绘历时性媒介批评的演变轨迹,更要将共时性媒介批评活动的具体内容展现出来。该书以大历史观整体性视野,注重从源头上对中国媒介批评渊源作出论述,专辟章节帮助读

者了解近代以前汉唐、两宋、元明、清前中期媒介批评历史,增强媒介批评学科建设的历史自信。其次,从唐代柳宗元笔下“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的进奏院状政治功能,到鸦片战争之际林则徐对外国报刊的“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实”的告诫、晚清“苏报案”、民国初年暂行报律风波、新记《大公报》“四不”办报方针,再到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学科萌芽、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成熟,该书注重展示近两千年来媒介批评的阶段性特点,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研究中国媒介批评的第一部通史类著作。

媒介批评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但由于学科建设较晚,有关“媒介批评”等核心概念辨析至今仍是当下探讨的焦点问题。胡正强教授直面学界关切,立足中国本土媒介批评实践经验,对时流三种主要“媒介批评”概念(即价值判断说、理性反思说、传媒评论说)一一臧否。该书从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中寻求媒介批评观,又从这些知识体系独立出来,澄清了“媒介批评”的概念内涵,深刻揭示了媒介批评的思想性、政治性、阶级性与新闻传播专业性,纠正了许多媒介批评论著对这一概念的一隅之见。